



影響臺灣文化和教育半世紀的一條街道

讀《書街舊事》

文字工作者 | 王岫



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

黃開禮著；心岱撰文／時報文化／201705／199頁／21公分／280元／平裝

ISBN 9789571369853 / 783

中山地下書街誠品 R79，在 2017 年 8 月 7 日開幕了，這是一條由誠品書店接手的時尚地下書街，長 300 公尺，結合書店和文創商店，符合現代文青口味的一種經營方式。其實，中山地下書街早在 2006 年 8 月就由藝殿國際圖書公司開始經營了，其原因是看上捷運旅客經過的流量，和夏季比較不怕炎熱的特性，初期的確有一番作為；但後來經營得並不理想，因其書攤任意擺置人行道上，光線不佳，又無甚分類，大雜燴似的，與以前牯嶺舊書街有何不同？因此，2017 年 3 月，藝殿國際圖書公司就退出地下書街的營業了，現在改由以時尚和文創引領風潮的誠品書店接手，相信又是書街一種新型態的開始。

中山地下書街，不管是十年前的藝殿國際圖書公司，或是目前剛起步的誠品 R79，大概就是現在年輕人心目中的「書街」印象。但是在中、老年讀者的記憶裡，臺北的所謂「書街」，卻是指重慶南路一段，從臺北郵局到衡陽路這短短不到一公里的路程。這條清朝時稱為府前街，日據時代叫本町通的街道，在 1950 年代，因靠近政府機關林立的中樞之地，又鄰接西門町和衡陽路等當時臺北最熱鬧街區，因此吸引了許多大陸時期的老出版社及撤退來臺的上海幫商人等，在此恢復行號或新設書店；物以類聚的關係，重慶南路一段的書店或出版社，越來越多，最盛時，曾達到一百多家，可謂書香滿街道。重慶南路書街的黃金年代，從 1950 到 2000 年，大概有半世紀的歷史，特別是 1950 到 1980 年之間，更是最鼎盛輝煌的時代。直到千禧年之前，才慢慢因電腦、網路的興起，改變了圖書出版及銷售的型態，讀者閱讀紙本書的風氣，也逐漸衰退，影響到以傳統書業為主的重南書街的经营，書店一家一家關門或停止營業。到 2000 年，書街只剩 20 家左右的書店在苦撐；到 2016 年，更只剩 10 家左右，若看到連老牌的商務印書館都變成旅店了，書街的確已不成書街，書街的精神也不在了，怪不得以後會有中山地下書街取而代之。

但這條書街，卻對臺灣上世紀後面五十年的教育和文化，有深遠的影響。在政府剛遷臺時，一切動盪不安，民眾面臨大時代的遽變，無論對知識的需求、文化的探索，都需靠書籍來療癒

身心及填補學校教育的不足。事實上，連學校的教科書，也是要靠出版社或書店編書、印書，書商銷售圖書的，重慶南路書街的存在，就是當時臺灣知識來源的主要地區，這裡出版的各級學校教科書，也擔負了學校需求的供應鍊；重南書街因書店密集，亦蘊育著城中區豐富的文化氣息，進而向周邊漫延，使臺北成為當時臺灣的文化重鎮。最重要的是，書街也培育了許多書商、出版人才，他們許多都在日後成為國內出版事業的掌舵人或重要人物；因此，重南書街的書業和書人，也是我國出版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

重南書街前正文書店老闆黃開禮先生最近寫了一本《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由作家心岱撰文），雖是以敘述他個人在書店業界一生的奮鬥為主，但也描繪了重慶南路書店街，盛極而衰的一段過程。過去寫重南書街的，多是斷簡殘篇為多，難得的是這本傳記性質的書，卻能在縱的方面，交代自己一生事業與書街的淵源，在橫的方面，也冷眼看到書街的風華歲月與一些相關書人、書商、書業的連結，在今日誠品書店以膜拜新文青品味而轉型的新出版市場時代，無疑的是值得我們緬懷和反思的。

黃開禮先生或許過去在文化界名氣不算大，許多人是因他出版這本《書街舊事》才知道他的。除了過去重南書街書店、出版社太多之外，他開設的正文、正元等出版社，不是大陸遷臺時的重量級老字號書店；加之他自己成立書店之時，重南書街已是戰國群雄雲集，爭出版霸業的時代；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他是學徒出身，沒有顯赫學歷，又是一個相當低調的臺灣人，在以上海幫掌權為主的重慶南路書街，並不容易闖出名氣。

但他的奮鬥過程，卻印證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話，在出版界，也是如此。他 16 歲（1951 年）初中畢業後，就進入大中國圖書公司的前身——國華書店當學徒，雖不必如機車行的學徒，每天得惹黑一雙手，卻也得勞動筋骨，從開門搬門板、打掃、搬貨、打包圖書、到郵局載運郵包……樣樣都得賣命苦幹，從清早六點忙到晚上九點，才得以躺下在公司後面的一條行軍吊床上。這要是在今天，根本不符勞基法，但他忠於職責，任勞任怨，強健體魄也因之鍛鍊而成。三年後，他才出師，得以接觸到跑腿、邀稿、收帳、編輯、印製、發行……等出版、書店業的基本功；其實這些工作都無老師指導，他得自己努力觀察、學習，才能奠下紮實的工作能力。到 22 歲時，他不僅抽空去完成高中補校的學業，在書店裡，也正式成為「先生」（公司較高層的職員名稱）。當時，許多學徒出師或成為「先生」後，多選擇自行出去開業，他卻繼續留在老東家效勞，累積更多實力和經驗，直到 1972 年，他在大中國圖書公司做滿二十年了，才辭職離開，自創正文書局。由於在這行業苦幹實幹累聚的人脈和工作經驗，使他很快重返重南書街，除了租有正文、恆生兩家書市門面，並在 1985 年，買下重慶南路上四層樓房，成立正元圖書公司，正式成為重南書街上書業大亨。但隨著重南書街以後十幾年的衰退，兩家門市及正元圖書公司也逐漸收攤，並於 2002 年全部結束營業。

開禮先生前半段效勞老東家的歲月，和後半段自行創業的日子，合起來大概就是重南書街



的黃金時代，因此，由他的工作內容和生活狀況，大致也可看出重南書街的書業型態。首先，與現代編輯、發行、門市多屬分工的出版行業來比較，可看到當時重南書街的書店，特別是在前期，幾乎都是三者一起包。書店、書局不僅是門市，也要自己編書、出版、發行，甚至於代中南部書局發送圖書，成為經銷商或中盤商。這種「書店」、「書局」、「圖書公司」、「出版社」、「經銷商」混雜的生態，是重南書街的特色之一，也難怪開禮先生的學徒和出師後的生活，都忙成一團，因為一個人要當幾個人用。但這也造就後來一些有實務且苦幹出身的出版家，如三民書局的劉振強等人。

其次，當時書業的門市或出版範圍，也頗多採取綜合性的經營，比較沒有所謂的專業性書店或出版社。從這本《書街舊事》中，不僅看到開禮先生的正文、正元出版社，甚麼類的書都出版，從國學到國外翻譯書、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等，幾乎出甚麼書都賺錢，連教科書也是他的範圍之一，故拜訪學校教師、校長……等，亦是他的重要業務之一。

至於從書中細節，也可比較出當時書業的繁榮。書中 109 頁寫到開禮先生 1972 年（後面年表寫為 1971 年）離開大中國圖書，當時月薪是 3,700 元，老東家只給他 1 萬元（三個月薪水不到）的離職金，他不禁悲從心來，認為老東家根本不尊重他這位工作賣命，做人誠懇的老員工。這是彼時尚無勞基法的無奈，但由當時他的薪水 3,700 元，比較我 1973 年，以高考資格進入省立臺中圖書館當館員的薪水，只有 2,000 元初頭而言，當時出版業者的薪水，比公務人員還是好太多了，這是不爭的事實。可見當時重南書街的繁榮，帶動員工的薪水不錯，也促使許多人，包括開禮先生，都要自行開業，擠身書街老闆的一員。

總之，這本《書街舊事》除了寫出開禮先生在書業打拼的日子外，事實上，也呈現了當時書店的營業內容，這裡面頗多已與現代分工詳盡的出版生態不同，值得留意出版史的研究者從中找出一些非正式的史料參考。

而其他亦有提到政府遷臺初期，大陸書籍輸入的管道（頁 30）、書籍打包方式的演變（頁 41）、50、60 年代的暢銷書、重南書街的書報攤的形成（頁 53）……等等，也是出版事業研究者較少人注目到的地方，非得如開禮先生有書街的實務工作者，才能仔細觀察到的。書中，偶而也提到一些當時書市的重要事件，如信義路上曾有的國際學舍（今大安森林）書展、西門町曾設立過的「中國書城」（頁 132-133），以及在重南書街曾經轟動一時的佔地七層樓房的光統圖書百賀公司的設立（在附錄中有條目）……等等，雖是出版流河上漂過的一景，卻被本書留影下來了。在書中，部份書商及少數文人、學者教授的身影亦被提到，如前述的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外，也提到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先生早年曾騎著腳踏車到重南書街的地攤，一攤一攤地去發配圖書；此外詩人周孟蝶也入鏡在此書中。學者、作家方面，則以對比方式，呈現作者自費印書，委託書店代售的方式，如臺大施建生教授自印的《經濟學》一書，非常暢銷多印，而頭城作家李榮春的自費出版的作品《祖國與同胞》，卻在大中國圖書公司滯銷且賣一本，作家就自虧一本的慘狀。這種小小逸事，無非也顯示重南書街，也是教授、作家即使自費出書，也想

擠身入境的舞台。

本書掛名黃開禮先生是作者，但由作家心岱撰文。心岱是善講故事的資深作家，故本書文筆流暢、淺顯易讀，讓人想一口氣讀完。除了開禮先生的奮鬥過程令人敬佩外，讀者藉由書街的發展，了解影響我國教育、文化的一條街道的歷史，亦能多有收穫。書中少數之缺失，則在年代的呈現；如作者離開大中國圖書公司的時間，本文和附錄差了一年；而附錄紀錄的年表——「大正九年—十八年」，亦顯然有誤，因大正年代只到大正十五年，下次再版時可更正之。